

## 第七章 认贼作父，眉来眼去 暗通日寇

作为封建军阀和反动政客的一大代表，阎锡山什么时候恐怕都难以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他来说自己的私利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阎锡山虽然在表面上不得不举着“抗日”的大旗，但实际上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暗中勾结日寇，认贼作父，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其实，阎锡山的“亲日情结”可说是早已有之，所以日本人才会频频向他发动劝降攻势；也许是在抗战期间的这种眉来眼去尚不足以令阎锡山“尽兴”，故而抗战结束后他便立即“延聘”日本人为其办起了省训团。

231

### 一 抗战初起，日本人三送“劝降书”

#### 五台日寇送劝降书

1939年前后，日寇改变策略，改攻为守，把对国民党军队进行诱降和瓦解活动作为主要策略。侵占山西的日寇亦认为：在华北争取阎锡山与日本合作（投降）是日本大本营的根本策略。驻在山西各地区的日寇，各找路线，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地大搞

诱降阎锡山的阴谋活动。

1939年夏，占据阎锡山家乡五台河边村的日寇（首领为少校大队长关××），通过该村维持会寻找阎的族人或亲戚能给阎送信的人。结果找到阎的表侄刘隆贵，日寇把刘带到兵营内，让他到陕北给阎送信。刘推诿说，没有出过远门，找不到陕北。日寇大怒，打了几个耳光，赶出营门之外。后来又找到阎的表侄刘春新，同样让他给阎送信云。刘春新知道刘隆贵挨了耳光，不敢说不去，只说路远愿意找个同伴前往。得到日寇的同意，开了通行证，发给少数路费，交付信件，吩咐信送到后赶快回来。刘遂偕本家刘进祥共同前往。实际他俩都是青年，感到敌占区不好生活，早有待机去大后方找阎锡山谋求生活的打算。他俩经太原、汾阳、孝义，到了晋西南阎锡山区域，从小船窝渡黄河，到了阎的长官部所在地宜川秋林镇。见到阎锡山，呈交了日寇劝降书。阎看信后，慑于舆论，吩咐其左右，将刘春新等暂送宪兵司令部看管。不久就释放了刘，并把他安排在内勤队（卫士队）生产小组工作，又把刘进祥安排在机要处当了译电员。

刘春新等走后不久，河边村日寇又胁迫阎的表兄曲容静（笔者的父亲）给阎写信劝降，曲推说年老有病，文化低，写不了这样的信。日寇让维持会长曲宜善代笔，写毕由曲容静亲笔书名。这封信，由河边村日寇送太原司令部，用飞机投在吉县，阎军拾得后呈交于阎。后来这两封劝降书，没有下文。

### 日寇大本营田中隆吉被派遣

1940年春，日本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派遣田中隆吉少将（日寇司令官由陆军省委派，参谋长由参谋本部委派），专程由东京来太原接充日寇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长（当时司令官为筱冢中将）。田中到任后，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备饭为田中接风。田

中事前了解到苏系阎锡山旧属，饭后谈话时，田中表示他这次奉调来山西，除指挥日军剿灭山西境内的抗日军队，扩大治安区外；更重要的使命是设法和阎打通关系，争取阎向日本投降。如阎真诚愿与日本“合作”，南注北阎共同支撑中国大局，中国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今后对阎工作，希望苏体仁多想办法帮忙。苏表示他出任山西省长，曾得阎的暗中支持。诚如田中所说，华北大局的善后，在日军的指导下非阎莫属。对阎工作，自己决尽全力协助办理。

### 晋中公馆的加强和兴亚黄军的建立

田中隆吉一面通过伪省长苏体仁设法与阎挂上钩；一面加强其司令部参谋部直属特务机构——晋中公馆（在东华门五号）的人事。派少校参谋斋藤主持，以“嘱托”（日军队中文职官员）小林高安为助手，收罗大批汉奸积极活动。这个特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阎诱降。兼做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情报工作；甄别和处理山西境内的俘虏，编制工程队（集中营），驱使俘虏做苦工。该公馆负责人斋藤受田中的指示，把1939年在离石柳林镇俘获的阎军第十九军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东北人）和团长汤家谟（阳曲人）成立日伪军——兴亚黄军，蔡、汤分任正副司令。从工程队挑选日寇认为可靠的俘虏500人，发给枪支（初时不发弹药），加以操练，驻防在与阎军交错的地区孝义县兑九峪一带，让蔡利用旧关系公开与阎军往来，达到瓦解部分阎军的目的。当时阎军驻隰县水头镇一带的暂一军傅存怀部与蔡来往密切。阎区物资缺乏，价又昂贵，阎军官兵可以到兑九峪赶集，购买日用品，既讨好阎军又可获得情报向斋藤汇报。此时阎锡山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在日阎勾结开始后，阎本想利用蔡做些工作，以赎其投日的罪过。但蔡慑于日寇的淫威，甘心附敌，对阎

若即若离，不很买账。后来这部分伪军编入日伪山西保安队，蔡失掉对阎报效的机会。日寇投降后，蔡被阎枪决。

### 苏体仁送劝降书

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自出任伪职后，早想设法拉阎锡山下水，作为自己的靠山，进一步谋求更高的位置。虽有此愿望，但不便与日酋有所表示。今既受田中的委托，遂敢大胆公开进行。于是委派其心腹人员在太原寻访阎锡山的亲近。不久询得阎的族侄阎宜亭（名志义）在东二道街二十二号居住，乃将阎宜亭请到省公署，苏亲自接见，问寒问暖，慰勉有加。当面委以参议名义，月薪100元。临别苏嘱其常来省公署座谈。阎宜亭为阎的近支族侄，青年时阎曾安排他在太原晋胜银行当行员，但他不务正业，染有鸦片嗜好，又讨了小老婆，颇为阎所厌恶，平时不大理睬。日寇进攻山西时，阎宜亭因囊中空虚，又有嗜好，无力到大后方逃难，只在太原城郊民宅暂避。日寇占太原不久，他就入城居住，因无固定收入，生活颇为困难。今既承苏特别照顾，可谓时来运转。但又想到与苏素不相识，突然如此关照，亦颇纳闷。当他第二、三次拜访苏时，苏就提出要他到晋西与阎送信。阎宜亭亦正想去晋西找他叔父阎锡山求乞生活费用。因而向苏提出，如能派人送到日阎交界处，他愿前往。苏满口答应，嘱其随时准备动身。苏向田中汇报，田中亦以日军参谋长名义致阎锡山函一件交付苏体仁，苏以个人名义致阎私信一件，一并交付阎宜亭，并发给路费，派人送至襄汾县古城镇以西日阎交界处。阎宜亭于1940年6、7月间到达阎的长官部所在地克难坡，见到其叔阎锡山，呈交信件，阎对阎宜亭热情接待，不像以往的冷淡寡情。询问了敌占区和太原的情况，嘱其多住些日子。此时阎锡山已经有了投靠日寇的念头，正苦于没有与日寇拉通关系的机会，阎宜亭

之来，正合阎锡山的需要。阎宜亭在克难坡住了一个多月，阎锡山赏赐了几千元法币，安排其返回太原，嘱其口头告知苏体仁，他将派人到太原与苏接洽。

### 田中隆吉再送劝降书

1940年秋，阎宜亭刚刚离开克难坡，又有白太冲其人携带苏体仁和田中的信件来到克难坡。阎锡山接见白太冲后，对白大加赏识。白在克难坡半月，经阎数次传见，委以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命其与汾阳日寇保持紧密联系，并设法开展平遥地方工作。

白太冲号绍左，孝义县白壁关村人，其父在汉口经营高利贷生意，家中富有。七七事变前，他从汾阳铭义中学毕业，找不到适当职业，在孝义城内游荡。其父逝世，白大事挥霍，结识了孝义县政府科长马尚荣（山西法政学校毕业，辽县人）。七七事变爆发，孝义县长开缺，马代理县长。当时兵荒马乱，县以下区长一职，无人敢担任，经马推荐，白任孝义某区区长。孝义沦陷后，白纠合了本县青年，拾了些枪支，进入汾孝山区打游击，旋经第二战区长官部委为汾孝游击支队长。1940年春被日寇俘获，送汾阳宪兵队处理。当时汾阳日寇宪兵队亦有诱降阎锡山的任务，在审讯时，问他愿否给皇军办事，与阎军骑兵军（驻隰县孝义交界）的军官熟识否，认识阎锡山否。白答称：他很愿给皇军办事，他和骑兵军的军官都是熟人，如将他放回，他能把部分骑兵军的队伍拉过来，并诡称与苏体仁有旧关系。实际他希望如能把他放回二战区更好，不然找关系到太原投奔苏体仁当个警备队长之类的伪官也无不可。经过宪兵队威逼利诱，他投降了日寇，充当了汾阳宪兵队的便衣，专做第二战区情报工作。后又把他送交日寇太原司令部转交苏体仁，命他策划对阎的诱降活动。他见

到苏，说明他受汾阳日寇的委派，帮苏做对阎的诱降工作。当时苏体仁派遣阎宜亭去见阎锡山，一月有余尚无音讯，无法向田中交账，焦急异常。经过几次与白太冲接谈，他告白说：现在日军部愿与阎“合作”，如有人能拉通这个关系，将是莫大的功劳。白表示愿做这个工作，但奈何与阎不认识。苏说：我给你介绍，只要送到信，讨来回信就行。苏向田中汇报，阎宜亭久去不归，难以指望，打算另派白太冲前去。得到田中同意，田中又写了一封致阎的信，交付苏体仁，苏把他的私信一并交付白太冲，白到汾阳，向日寇宪兵队出示田中和苏致阎的函件，他们登时对白另眼看待，并给驻兑九峪的蔡雄飞写了介绍信。白到兑九峪，经蔡派人送他到水头镇阎军暂一军傅存怀军部，说明来意，傅拍电请示阎锡山，得到复电，准其前来。此后白太冲与阎锡山开始直接发生了关系。他有了汾阳宪兵队便衣和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并平遥县长的双重身份，从此，他给日寇送有关二战区、八路军的情报，也给阎锡山送日寇的情报。他送的情报虽不完全真实，也不完全是胡说，因而在两方面都很红。后来他在日阎勾结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40年至1945年日寇投降前的五六年当中，他往来于太原、汾阳、孝义、克难坡之间，成了汾孝地区有数的“显要人物”。

### 日阎人员、信件之往还

1940年4月间，我当时在克难坡西北实业公司随部办事处工作，听说前线送来日本俘虏，在副官处窑洞看管。过去送来日俘，都转送西安日俘管理所收管。我为了好奇，前往看俘虏。经过用日语交谈，该日俘名小林一雄，系一汽车司机，在临汾附近被俘。中午阎锡山吃饭时（阎吃饭时间，办公人员都退去，其家属和亲戚可以见他），我把看见日俘的情况和将要转送西安的话

向他汇报。阎听毕即向其侍从长张逢吉说：告保安司令部说，这个日本人不要送走，交杨贞吉看管。后来阎指示杨贞吉对这日俘要优待，上干部灶，如安分的话，可让他随便游玩，不要限制其行动。我经常遇到小林由一个士兵带领在克难坡到处闲游。因为懂日语的人不多，他遇到我，一定要拉我和他闲扯。询其是否想家，他说如果能回到日本部队，决心不当兵了，马上请求回国，和他的母亲弟妹团聚。后来小林不见了。传说小林夜间逃跑，被杨贞吉派人抓住，就地枪决了。以后了解到，原来阎锡山留下小林，加以优待，准备需要时，利用小林作日阎之间的联络工作。所传逃跑枪决，系杨贞吉放的烟幕弹，实际上后来大矢正春由克难坡回太原时，阎将小林一同送走，以讨好日寇。

同年6月间，长官部交际处长翟全晋（修三）找到我说：“六十一军由临汾送来两个日本人，据说是投降来的，其中一个会说中国话，但是听不清楚，请你给问一下情况，好交代长官。”我即随翟到了交际处窑洞，见到两个日本人，我作了自我介绍，谎称我是长官部日文秘书。其中一个矮个的说：我叫大矢正春，另一个较大个的说我叫前田干男。大矢说：“我俩是潞安日军舞部队的代表（舞系日寇师团长，驻长治），冒着危险，不顾生命来求见阎阁下的。”问他们在部队担任什么职务，大矢说：“我是日侨商人，前田是朝鲜人（有的朝鲜人改为日本姓名），是我的翻译。”大矢随即打开包袱，从一件夹衣缝内取出日寇军用证明书一纸交给我。大意写的是：兹证明大矢正春、前田干男等二人系本部队派往贵战区的使者。此致阎长官阁下。昭和×年×月×日。第三十六师团长，下盖舞的名章。询其前来任务，大矢讲了一通“中日同文同种，不应互相残杀。日本军人已经后悔，中日应即讲和。我们了解阎阁下素与日本友善，中日讲和，应从山西做起。因为日本军方，无人敢冒险前来，我俩为了中日两国的前

途，挽救几千万中日士兵和老百姓的生命，置个人性命于度外，冒死前来。”我把大矢的情况告知翟后，翟对他们表示，既是因公而来，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要害怕。翟和我把这情况向阎锡山汇报，并呈交了证明文件。阎听着很感兴趣。对翟说：“把他们送交李司令（宪兵司令李润发）优待看管，不许与任何人接近。只说是俘虏，不得泄露他们是干什么的。”隔了一天，阎传见我说：“你拿我这个手令去找李司令，再和那两个日本人谈谈，摸清他们来的目的究竟是干什么，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我到宪兵司令部，由李润发陪同去看大矢等，闲扯了两个多小时，大矢说的仍然是前天那一套。为了摸一下他们与日寇部队哪些人有来往，我说：“如要给你们上司或朋友写信，报告你们平安到达，我可以派人到临汾投邮。”他们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们愿和日军取得联系，请你们等一下。”大矢随即从包袱内取出纸笔，希望我给他两个信封。写毕交我。一封是寄给潞安舞部队今井高级参谋的，一封是寄给太原友人的。信的大意是：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二战区的心脏地克难坡，承特别优待，一切顺利，不要挂念等等。让他们写信是想了解他们和哪些人发生关系，是不是真正由日寇部队派来的。从投信地址看出他们既和舞部队有联系，也和太原日寇有关系。我把两封信带回，没有投邮，向阎汇报了情况。过了四五天我又奉阎命，去看了他们一次，也没有摸到新的情况。问他们和太原日军司令部有联系否。大矢说：“太原参谋长田中，也曾见过面，有几位参谋是熟朋友。舞部队虽是地方驻军，但也是奉太原司令部之命行事的。”阎认为大矢虽与日军有联系，不是军人，又系潞安部队派来，不便有所表示。他本想和太原日寇发生关系，遂决定由李润发派人将大矢、前田连同俘虏小林一雄一并送隰县交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再由赵派人送交太原日寇司令部，让他们向太原日寇司令部报告，以讨



好日寇，也等于阎和太原日寇直接发生了关系。赵派其少校驮运队长阎立人（阎的族曾孙）偕大矢、前田、小林等经灵石双池镇（日寇驻地）到灵石车站乘同蒲车到太原，径到日寇司令部。参谋部派军官接见，送阎立人旅费 1000 元，并嘱阎立人代向阎和赵表示感谢。阎立人在太原游玩了几天，日寇司令部又派人送他到双池镇。

过了一个月，大矢、前田又来到隰县求见赵承绶，携有田中隆吉致阎信一件。赵将大矢等安排住处，派人陪伴，不许外出。同时派人将田中信快马送克难坡。

有一天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找我，说：“老弟！你去隰县辛苦一趟吧。”我问何事，他说：“那两个人又来了，你给赵印甫送封信去，并且和他们谈谈。你可住义成粮店（公营商号），任务是视察粮店业务。”吴将信给我，信封上写“印甫亲启”。次晨我带马伕一人，两匹快马直奔隰县。第三日中午到达，受义成粮店经理武德田的招待。我让他准备向我汇报业务情况。当晚去见赵承绶，交赵信件，赵拆封，内有阎以赵具名答复田中一信。赵看毕，交给我看。大意说：“奉阎长官交下阁下致阎长官一信，拜读之余，感佩良深，诚如阁下所示，目前中日两国共同祸害，是中共势力的日益壮大，若不及早剿除，不但中国将永无宁日，日本亦不能不受其影响。阎长官素有建立亚洲同盟的主张，推日本为盟主，共同对付英美。深望相互提携，共同剿共，以达共存共荣的目标，中国幸甚，日本幸甚。”我问大矢这次来，有没有其他表示。赵说：“我这里没有懂日本话的人，他们的中国话，又谈不清楚，你和他们谈谈吧。”赵吩咐左右把两个日本人引来。大矢、前田见到我，表示特别亲热，千谢万谢上次我在克难坡对他们的照顾。我问这次来除送信外，有没有口信。他们说：“田中阁下说，把信送到，讨来回信就行。不过田中阁下表示，像赵

阁下这样的‘大人’，能早日到太原见面，那就更好了。”他们说：“这次来没有想到又能见到你，没有给你带来礼物，抱歉得很。把这两本杂志（《中央公论月刊》）送你吧。”我了解到他俩不是谈判的对象，纯粹是所谓送信的使者。遂与握手告别，嘱其一路小心，有机会再见。大矢等完成了送信的使命。

1941年日阎勾结正式开始，大矢再未露面。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在西北实业公司工作。1946年有一天，大矢持名片来访问我。寒暄后，始知他被留在阎军第十纵队（阎留用的日本人军队）当少校。谈到当年为什么敢冒险去克难坡的事，他说，他当时是太谷宪兵队的便衣，在太谷城内开设旅馆，过往的军官常住他的旅馆，所以校级以下熟人很多。在同蒲路火车中遇到潞安舞部队上校高级参谋今井××，系大矢的好朋友。谈到当时对阎的诱降工作，是华北日军最迫切的任务。大矢认为要做阎的工作，必须见到阎才能收到效果。如果只在日本占领区内作些不痛不痒的宣传，距离这么远，怎能使阎相信日本有诚意呢？今井同意大矢的见解，但又认为哪里找到这样勇敢的人去深入阎方呢！大矢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天皇陛下”非有必死的决心，才能有希望完成这个使命。今井说：“看来你似有此决心。”大矢说：“我虽愿为‘天皇’尽忠，可惜我身份不行。”今井说：“你既真的愿去，我可以给你出证明，作为本部队的代表身份前去。”大矢表示感谢。最后约定由舞部队派翻译一名，偕同前往。今井上校回到潞安后，即派翻译前田携介绍信（证明书）来到太谷，大矢和前田，本来互不相识。到临汾六十一军防区时，他们说要向二战区投降，受到六十一军的优待。他们回到太原后，受到太原军部的重视和田中参谋长的奖励。我说：“你既在拉通日阎关系中立了大功，为什么以后再没参加这个工作？”他说：“军人是奉命行事，上级没有命令我参加，我只好不参加。

我文化很低，只是小学程度，干不了大事。不过尔后日阎关系的发展情况，我是时有耳闻的。”

(曲宪南)

## 二 从暗送秋波到签署秘密协定

### 七七事变前后阎锡山与日寇的暧昧关系

阎锡山自1930年扩大会议失败后，在逃往大连的期间，同日本就发生了暧昧的关系。1931年秋，距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他突然从大连乘坐日本飞机回到大同，并且在和赵承绶的密谈中，提到张学良“此时方自顾不暇，哪能顾及我们”。后来，他的参谋长朱绶光也曾秘密告诉黄国梁说：“华北纵然被日本侵入，山西也不至于陷于兵灾。”从阎锡山当时的行动和上引这些谈话看来，他不仅对于日寇侵占东北以至华北的阴谋有所预闻，而且必然已经同日本有了具体的勾结。他们之间的条件虽然无从详悉，但日寇决不会只限于使阎专管山西，必然要他在华北搞出一种什么局面来，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当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入山西时，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也同时迅速进入山西作战，这样，就暂时地把阎锡山同日寇勾结、投降日寇的预谋打断了。

此外，阎和日本的暧昧关系，还有以下几种迹象：（一）在七七事变前一年，阎的亲信、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汝舟和民政厅长邱仰浚先后到过日本。蒋介石政府曾经电阎询此二人赴日有何事故，阎答以系私人行动。这当然不是什么私人行动，不过个中真相无从探悉罢了。（二）太原绥署参事苏体仁，一向是代阎办理对日外交事务的，当日寇侵占华北最紧急的1936年冬季，苏忽来平，和日人林龟喜经常往还，直至七七事变，迄未回任；同

时，太原也设立了日本领事馆，日人在太原到处横行。

林龟喜是日本大仓洋行驻北平的经理。当时，凡是日本来平的文人政客，大都住在扶桑馆；凡是军人，大都住在大仓洋行。这地址就在北池子，原为张镇芳的住宅。日本军人经常在这里通过林龟喜与中国亲日派和汉奸们接头，俨然是一个大型的特务机关。林龟喜精通汉语，熟悉中国官场情况，和山西久住平津的官员往来有素，与梁上椿私交更厚（因梁妻是日本人）。梁也是参与秘密的一人，苏体仁与林龟喜的往还，也是通过梁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勾结的具体内容，虽然局外人不得而知，但他们对南桂馨也说过像朱绶光对黄国梁所谈的那些话。两相对照，阎与日本的关系就更为明显了。

山西沦陷后，阎锡山从汉口派宋彻来平，策动南桂馨、温寿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被任命为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

泉、苏体仁等回晋成立伪组织。不过阎对他们三人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他认为南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他的属下，在本省也有些声望，假定此际出来替他维持山西局面，可能获得日寇的青睐。南如不出，其次则是苏体仁。苏也是日本留学生，而且替他办理外交有年，是他培养起来的人，自然会听他的话，大事也会和他通气，尽可能不

悖他的意旨。至于他让温寿泉回去维持，只是陪衬，并非真意。因为在辛亥起义后，温当时是副都督，因和阎意见不合，离开山西；直到山西政权扩展到冀察以后，阎才给他一官半职（河北省建设厅长）。商震去职，温也久已赋闲。同时，温虽留学日本，但和日本人往来不多，日本也不会要他。阎不过是为了敷衍面子，所以也提了他的名字。总而言之，阎意最好是南、苏合作，否则二人居一，提温并非真意。

### 日、阎对南桂馨的诱迫

日本侵华，历来是从多方面寻找它可以利用来作为汉奸走狗的对象，所以，在山西方面除了阎锡山以外，也想拉拢南桂馨。山西内部，原有三派：一是以赵戴文为首的赵派，一是以南桂馨为首的南派，一是以田应璜为首的议员派。议员派自田应璜死后已经分化，而且这一派原来对于山西内部并没起过重要作用，就是田本人，对阎也是“尊而不亲”，只是过去替阎办办对奉张的外交而已。至于赵派，对阎唯命是听，实际就是阎派。对于某些事敢于在某种程度上与阎对立的，只有南派。日本人想着阎如不能就范，令南回晋，既可以号召他本派的人，又可以吸引他派的人，共同来替他们奴役山西。南虽一再表示“不为”，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而且阎从太原撤退到平阳后，在他的“行辕通讯”上，已经刊登出南桂馨准备担任汉奸省长的消息。南在津知道后大愤，因此时电报不通中央，乃托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局址在英租界，尚未移交日本）代他发一向中央否认“行辕通讯”消息的电报，但张未应允。苏体仁劝他不必介意，以为阎不过“想当然耳”，并无恶意。

正在这时，太原经过一守一攻，一出一入，老百姓灾难很重，南、苏及其他在北平的晋籍人上，拼凑了相当数目的赈款。

经过日本驻军同意，由贾政斋持款回太原发放，并仿北平例子，组织维持会。其会长人选，大家提议由一无党无派的老者曾纪纲出任，众无异议。贾回太原后，即成立了维持会，以曾纪纲为会长，并由该会选出南桂馨为省长，温寿泉为公安厅长，但当时温、南均不知道，后来也均未就职。

曾纪纲因年老，不久即故去。这时高步青正托南设法参加日伪组织，南因提议由高回晋任维持会长。高初已同意，并由林龟喜介绍，见了日寇驻平特务机关长喜多。但高忽又改变原议，欲做省长。林龟喜大怒，谓南曰：“你们出尔反尔，太不像话，高某不回，你要负责；你无办法，我们有办法！”高知事不妙，始又承认原议。南至此有些畏惧，遂入德国医院，拒见日本任何人物。后为宋彻知晓，唆使日人福田川次郎以向南索债为名（晋北应县曾集股办了一个亚麻公司，南为董事长，买过一架日本“帝国制麻公司”的旧机器，说明公司获利后再偿买价，这时尚未获利，福田出资买到这一债权），大闹德国医院。此事经德国领事干涉，并由南向大陆银行挪借两万元，终于了去这笔债务，结果，宋辙之计不售。日方见南回晋无望，乃转向苏体仁等。

### 日、阎与苏体仁

244

苏体仁是朔县人，本是贫苦出身，经他长兄以仁的培植，留学日本，回国后，因受同乡先辈出应璜的保荐，担任省立一中的校长，又因南桂馨的保荐，调任山西大学预科学长兼督署日文秘书；后来又由他的族侄苏峻山的介绍，结识了赵戴文（俊山为赵的学生）。如果按山西的派别说，他是身兼三派的分子，但因他地位较低，所以三派对他都不忌妒。后来他在阎锡山同日本勾结方面曾为阎出力不少，为人也比较谨慎，因而得到阎锡山的信任。

七七事变以后，阎派宋彻到平传达阎意时，苏表示如果南桂馨肯回省，他愿帮南，担任秘书长或厅长职务，伪华北政府成立时，日方通过原田（日本大使馆参赞），伪方通过王揖唐，拉南桂馨参加（作建设总署署长），南拒绝。其他日人也劝苏体仁参加（做次长之类），苏知道南不干，也拒绝了。在南入德国医院后，日本人逼他回晋组织伪省府，他迟疑不决，后来日本宪兵到他家搜索威吓。他因住不起外国医院，就入了蒲伯扬医院。后由于日方的胁迫和林龟喜、梁上椿的劝告，终于在1938年春决定回晋。他带着伪华北政府的命令回到山西就任伪省长后，为了对阎表示服从，首先以宋徽为民政厅长。华北各省的伪省长，无论用人行政，都是通过日本顾问，服从特务机关的。但是苏到任后，关于简任人员，他可和日方商酌任用；各县县长由他陆续撤换的很多（日军到晋后，利用地痞流氓做县长，这些人勾结日本宪兵和翻译、欺压人民，无所不至），遇事也可向日本军方力争（如日方要增收公粮，苏始终反对）。这都是各省没有的先例，而日方竟能多所容纳。日方之所以如此，目的就是要通过苏体仁来勾结阎锡山。

### “汾阳协定”和“安平会议”

如前所述，自阎由日人护送从大连飞回山西以后，始终和日本通款的，但这不是一根直线式的发展，而是藕断丝连的。阎是两面派，在国内战争时如此，在抗日战争时也如此。他不是真心抗日，抗日为的是欺骗群众，抬高身价；他也不敢真心联日，目的是要自存，也就是要挟日本来向蒋介石讨价还价。日本和他联系，也不是真要通过他统治华北，而是一种诱降手段，使他脱离抗日阵营，瓦解中国的内部团结。双方各怀鬼胎，从而在抗日期中，阎锡山对日本是亦勾亦抗；日本对阎锡山是亦打亦拉。明

白了这些情形，然后再叙“汾阳协定”。

先是，汾阳县的一个区长名白太冲的，因被日本俘虏而做了日本特务。他带着日本宪兵大矢秘密到占县见了阎锡山，说明日本愿和他合作。阎在这时，正因傅作义的脱离，陈长捷的动摇，蒋介石的不发饷，旧部走投蒋介石去做官，新军力主抗日，投向八路军去革命，眼看着有土崩瓦解、将被消灭的趋势。因此，阎也愿意和日本更进一步地勾结，派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到了太原，找伪省长苏体仁和梁上椿向日本交换意见。阎在这时，又恐怕部下不赞成他的这种做法，所以强调他的两句格言“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大作思想动员。那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的存在，勾结日本，甚至投降日本，也是合理合法的；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不在他心上的。

苏、梁提出了阎锡山的具体要求以后，太原日本军部认为阎的要求太奢，几乎搁了半年，没有决定。后来日本陆军省特派田中隆吉到太原说，只要阎肯合作，任何条件，都可暂应允；言外之意，就是等他通电脱离抗日阵营之后，什么条件，都可不算。太原日本军部接受了这个指示，因而答应了阎的要求。在“汾阳协定”之前，阎派赵承绶到了孝义县白璧关村，通过白太冲和日本驻汾阳旅团的参谋长宫内协商，要求日方先把孝义县城让出来，由阎派军接防。日方应允后，赵承绶的部队就开进了孝义，这就为“汾阳协定、阎日合作”先打开了通道。

“汾阳协定”的时间是1940年夏秋之交，双方代表人如下：

阎方代表：赵承绶、温怀光（三十三军军长）；

日方代表：安边（华北军参谋长）、南山秀吉（太原日军参谋长）；

中介人：苏体仁、梁上椿。

协定主旨是“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



内容共有 20 多条，因年久了，不能逐条记忆，但其要点不外以下几项：

阎向日本要求：

(一) 给予步枪五万枝、轻机枪 5000 枝、重机枪 500 枝、子弹若干万粒；

(二) 给予军费 700 万元；

(三) 条约签定后，即由山西伪省府供给阎军全部给养；

(四) 先由伪省府从山西境内代阎招足 50 个团的兵数，使阎回到太原，统治山西；然后再编 50 个团，使阎进驻北京，统治华北；

(五) 日本把山西省的政权交还阎锡山，由阎委人陆续接任各县县长职务。

日本向阎要求：

(一) 阎通电全国，脱离抗日阵营；

(二) 阎将小船窝的黄河渡口交给日军驻守（意在断绝阎和蒋介石的联系）；

(三) 阎所统率的军队，营以上的单位必须请日本人任顾问或指导官；

(四) 阎先将他的总司令部移到孝义城内，并在太原、汾阳、孝义、运城、临汾等处设立联合办事处，互通情报。

在这协定成立后，日本就给了阎步枪 1000 枝、军粮 5000 石，在孝义拨付，作为定物。但双方对此协定，均无诚意；阎是为了骗取日本武装并推缓对他的攻击；日本是为了骗阎脱离抗日阵营。所以，协定一直没有履行。过了些时，阎派赵承绶代表他到了太原，向日军索取“汾阳协定”所允许的军械。赵住了三个来月，年底才回防，但始终未从日方得到任何供给。1941 年 4 月，赵承绶又代表阎到了太原，重申前议，催日执行。日本人对赵说：“阎

锡山骗遍了中国军阀，难道还想骗我们日本不成？你代表不了阎锡山，我们不和你谈，非和阎面谈不可！”赵住了一星期，就回去复命，结果，又产生了“安平会议”（安平村在吉县，阎很迷信：他驻吉县，取义“万事大吉”；驻宜川，取义“便宜百川”（阎字百川）；这次会议选定安平村，又是取其“平安”之义）。

安平会议的时间是1942年5月6日，双方代表人如下：阎方：阎锡山、赵承绶（集团军总司令）、吴绍之（太原绥靖公署第三办公室中将主任）、杨贞吉（省公安厅长）；

日方：安边（华北军参谋长）、花谷（太原日军参谋长）、岩松（太原日军司令官）；

中介人：苏体仁、梁上椿、林龟喜（林未出席）。

在会议前，阎听说日本人带有照相机、电影机等物，他通知中介人要求日方不得在会议时拍照。但日方未允，竟然照了相并拍了电影。阎很愤怒，对梁上椿说：“这点事都办不到，还能和日本人共事吗？”而且阎希望日本先给军械，日本希望阎先行通电，进驻孝义，矛盾重重，会议自不可能有何结果。在会议上阎发言说：“我们的中日合作，只能承认日本是盟主，中国的一切，必须自主。共荣不能是日本独荣，共存不能是日本独存。照你们的办法，我无法向中国人交代，从而也不能号召中国人。如果是要名存实亡的政府，现在南京已经有了汪精卫，北京也有了王揖唐，何必要我呢？”在阎发言时，花谷掉头不听，昏昏欲睡。花谷发言时，态度傲慢，用教训的口吻对阎说：“珍珠港一战，英、美都被我们打垮了，何况蒋介石？日本有必胜的把握，你如愿和我们合作（就是投降），这时机万不可失，稍纵即逝，你要三思。”会议就开到这里，不欢而散。会后，日本又要求阎锡山立即通电脱离抗日阵营，阎谓考虑一个时间再说，会谈就此决裂了。日方来时用骡马运来了很多礼品和400万现钞，本来是用以

诱阎的，会议决裂后，又原封未动地运回太原。

在会议以前，阎还有意拉拢日本，自得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以后，他认为日本得罪英、美，非失败不可，但会议已定，只好开一开，可是从此更无诚意，所以说了以上的那些话；但他在太原和汾阳所设的办事处并未撤销，同日寇的关系还是藕断丝连。日本人回太原后，大骂阎锡山，并且印发了若干传单和会议的照片，用飞机散发到蒋区重庆、西安一带。日人此举原系有意用来伤害阎的，但蒋介石得悉后，反而恐怕他真和日本人合作，急派徐永昌、贾景德向他疏通，以后军饷如数按月发放，并给贾景德以铨叙部部长的位置。阎的困难，反而因此解决了；日本没利用了阎，反而被阎利用了。日本鬼子“鬼”，阎比他们更“鬼”。

日本之用苏体仁，原来是企图利用他来联络阎锡山的，现在既然同阎锡山弄僵了，当然也就要把他甩掉。因此，日方首先裁掉他的特别费。其次，花谷授意日本顾问经常殴骂省府职员，使苏难堪，并逼苏把撤换了的阳曲县县长么伯璋（日本侵太原时委任，原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技师。）立刻复任，还向他道了歉。苏受此种屈辱，他的伪省长再也做不下去了。这年冬季，他被调为伪北平市市长，就借此溜之大吉。苏体仁在调伪北平市市长后几天，就转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最后做了王荫泰的政务长官。但他每转一任，均向阎报告经过，请示应付策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

### 冯司直与王骥

冯司直是本省平定县籍，清朝举人，日本经纬学校毕业，能说日语。他原属赵戴文派，曾任省长公署的教育科长兼省教育会的会长。后来崔廷献继南桂馨做天津市长时，他又做了天津市府秘书长；回省后也做过教育厅长。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往上

爬。山西沦陷以后，他既是留日学生，就认为时机不可失，总想要取得伪省长的地位。日寇在华北各省以至各县，都设有“新民会”，这一机构是日寇利用汉奸来奴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凡做新民会领导的人物，必须是死心塌地、甘愿做日寇的忠实走狗的头号汉奸，而冯就是这一类的人物，担任了山西省新民会的会长。但他不满意于这个地位，在苏体仁做伪省长时期，他就常常向日本鬼子方面造谣攻击，借此献媚，并且利用与伪华北政府的政务委员长王揖唐同年的关系（王和他是同在一年中的举人），与王大事拉拢，互换照片，互和诗篇，借图达到取苏而代之的目的。苏既调到北平，水到渠成，他就继苏做了山西的伪省长。他既然甘心做大汉奸，当然为虎作伥，唯日本顾问之命是听。久之，舆论大为不满，就是他的同类人们，也恨他过于无能。日寇知道他不能很好的达到奴役山西人民的目的，终于把他甩掉，使王骧接替他的伪省长的职务。

王骧是山西寿阳县人，早年他的同县人崔廷献做保晋煤矿公司经理时，他做稽核，可以说是受崔廷献的卵翼而起来的。他后来渐渐上升，居然做了省银行的经理。抗战时期，他不知为了何事，和阎锡山不合，这时崔廷献住在香港，他也就跑到香港住起来了。珍珠港事件后，崔认为日本在中国可以持久，怂恿王设法回省参加日伪组织，相机行事。这时日军驻晋的参谋长花谷，以前在伪满任职时和在南满铁路做事的王骧同县人赵某很熟。王骧有此线索，就北上找赵介绍他见了花谷，先任桐旭医院院长；在冯司直做省长时，转任教育厅长。他知道冯做不下去的时候，又有花谷的靠山，他也渐渐活动起来了。然而这一举动，大为在北平的阎派人物所不满，因而林龟喜一类的日本人也通不过。王骧知道这种消息，亲到北平找到梁上椿。梁说：“冯司直敢背阎独立做了省长，将来一定杀头。你和他不同，受过阎的培养，也做

这个勾当，真是大胆！”王表示绝无背阎之意，至于泣下，并请梁代为设法。后来梁也替他向日方疏通，终于取得了伪省长的地位，一直维持到日寇投降。

由此可见，阎锡山对于山西，即使在沦陷时期，也毫不放松，而是千方百计地通过他的一些亲信羽翼同日寇沆瀣一气，串通勾结，来维持他的统治。

(南桂馨 赵承绶述 李泰棻记)

### 三 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脚踏“三只船”

1939年晋西政变后，阎锡山深感自己处境艰难，于是暗中日寇勾结，欲借日本人的势力消灭解放区的八路军，以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实力。本文介绍了他如何派人与日伪政府勾结；如何将军队、干部送给日本人；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情况。

关于阎锡山1939年12月晋西政变等详细情况，已由赵瑞和陈长捷等撰文，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和第40辑刊载，不再重复。现在谈谈我亲自参与阎锡山与日寇媾和目睹的事实。

#### 派干部去太原与日寇勾结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觉得处境艰难，三面受敌，形势孤立。如在西安之胡宗南时有打击吞并之势；新民起义后提心吊胆，时刻惧怕决死队八路军消灭他；侵略太原之日寇屡次威胁压迫他投降作汉奸。凡此种种，都给他很大压力，故在1940年7月，指示其亲信将领王靖国派长官部上校参议张仲孚，持王靖国的亲笔信，潜往太原找日伪“兴亚皇军”司令蔡雄飞联系，企求与日寇合作，共同“剿共”。（蔡雄飞原是晋绥军第十九军六十八师副师长和王靖国系保定军官学校五期同学，与张仲孚是东北同乡，又

有长官、部属的关系，私交密切。)信中云：“雄飞学长：前函奉悉，斡旋合作，面陈会座（阎锡山），颇为赞许。特派长官部上校参议张仲孚，持函到并（太原）联系，请大力协助转介日方，顺利进行。详情由张面陈不赘，敬祝勋安。学弟王靖国手启。7月10日。”

在张仲孚由克难坡去太原之前，王靖国一再嘱咐说，若未见到蔡雄飞，要绝对保密，妥藏信件。万一在途中或在太原发生意外，速将信件撕毁。当时蔡雄飞的“兴亚皇军”司令部，驻防在孝义县属之兑九峪。张仲孚计划由隰县石口镇通过大麦郊，到达兑九峪。王靖国对张仲孚选择的这条路线不同意，认为大麦郊到兑九峪之间有一段路，是真空地带，八路军经常在这个地区活动，危险性大。王靖国决定，派其军部少校副官刘宗康，利用安清道门的关系，偕同张仲孚到洪洞县。他们找到当地安清帮、托洪洞县伪警察所长，起出良民证，于7月18日乘火车到太原，以商人的身份，住在太原市米市大街佛照楼旅馆。

张仲孚在7月20日下午见到蔡雄飞。因为王靖国给蔡雄飞的信，藏在张仲孚的被套里，当天来不及交出。张仲孚在蔡的家中吃完晚饭，到夜里11点钟回到旅馆，决定21日上午8点钟将信送给蔡雄飞。不料在21日天明4时许，张仲孚被日寇宪兵队抓走。经蔡雄飞与日寇小林参谋交涉释放，当日上午9时，由日寇宪兵队长陪同张仲孚会见了小林参谋和蔡雄飞。12时许回旅馆取出王靖国的亲笔信，交给蔡雄飞。当天下午7时许，由小林参谋和蔡雄飞，陪同会见日寇山西派遣军军部筱冢参谋长，并设宴招待。筱冢表示：他从前在包头时，和王靖国、赵承绶很熟识，现在很愿意通过王靖国的关系，早日和晋绥军达成友好协议，共同“剿共”。9时许举行会谈，筱冢提出一个双方合作草案，指定阎属第七集团军，赵承绶部驻晋北原平、崞县一带；第

八集团军孙楚部驻晋南临汾、运城一带；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部驻晋东阳泉娘子关一带；阎锡山的长官部驻太原；直属部队驻榆次、太谷一带；并欢迎阎锡山到北平就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主持华北大局。太原长官部由副长官杨爱源主持。日军部队转移到外线，内线防御另由晋绥军负责绥靖地方。并抽调一部分晋绥兵力，配合日军进行扫荡，消灭山西境内之八路军。

这个草案由张仲孚带回克难坡。张仲孚走出口寇军部大门，正遇伪省长苏体仁派秘书坐汽车在门外等候，接张到苏体仁公馆。苏体仁一再表示，日军确有诚意，希望阎锡山从速与日寇达成协议，早日脱离蒋介石政权，返回太原，恢复力量，和日军配合肃清山西境内之共军。次日筱冢参谋长派人送来夏布、各种罐头、洋酒和雪茄烟等，大批礼品分送王靖国等。

后来王靖国又派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白太冲，到太原回复日寇所提的合作草案，通过蔡雄飞达成汾阳协议和阎锡山亲自参加的安平会议等协定条款。

### 派部队投敌改编为“剿共”军

阎锡山阴谋派部队公开投日反共，又怕社会上广大群众舆论攻击，便耍了个花招。他令驻孝义县之骑兵军军长温怀光，派部队深入沦陷区（日占区）抢征食粮，一面暗中派人指示蔡雄飞通知日寇，届时派日军包围，以便改编为反共部队。温怀光即派他所属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诚，率部深入到平遥、汾阳之间日占区，净化村附近抢征食粮。日寇早有准备，从汾阳、平遥、介休、分路出兵，将赵瑞、杨诚两师部队，包围在净化村。当时赵瑞、杨诚不了解阎锡山投日阴谋，还电请阎锡山派部增援解围，但援兵不到，日寇紧逼村沿。赵、杨两师长根据阎锡山曾讲过“存在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话，立即派副师长段炳昌

手持白旗向日寇投降。日寇令他们先行放下武器，并将官兵4000余人运回太原市内后小河营房受训。经过一个月训练，编为山西日伪“剿共”军，赵瑞编为第一师师长，杨诚编为第二师师长，每师辖两个团，没有军部。日寇为了方便掌握这两个师的伪军部队，由太原日军军部派一个中佐参谋，带一排日本兵，组成“剿共”军指导部，实质上这个中佐参谋就是赵瑞、杨诚两个傀儡师长的太上皇。因一切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等，均经过这个指导部批发补给。赵瑞之第一师开往沁县、襄垣县的盘镇，在日军指挥下反共；杨诚第二师开往晋东南陵川县、长子县，在日寇指挥下，反共反人民。

蔡雄飞曾经亲自和我谈过，他说赵瑞、杨诚二师投日是阎锡山准备回太原与日寇合作反共的条件，但抗战区人民，还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 派干部进入日伪政府

1942年春，阎锡山令我回太原，帮助汉奸省长苏体仁整改山西日伪警备队，他说：“如果你能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些部队，到抗战胜利后，够一团编一团，够一师编一师，够一军给你编一军，这叫曲线抗战。”我未经考虑就接受了这个卑鄙任务。到太原后，经济骏鸣（阎日联络代表）介绍与伪省长苏体仁晤面。他把当时山西全省日伪警备队现状作了介绍。他说，全省辖四个道，共计80多县。每县警备队有的三个中队，有的四五个中队不等，（每中队相当一个连）每县由县长兼大队长，另设副大队长一人，由当地日军派指导官一二人。他准备增加省道机构，统一领导，让我拟一编制计划草案。

到5月初，我把这个草案送交伪省长苏体仁，他说，日本军部尚未通过，需要和当地日寇驻军研究才能决定。不料，6月间



的一天拂晓，我生病在床，睡梦中，日寇宪兵队数十人突然包围了正丰饭店，闯进我的住室，将我逮捕，同时将饭店两位伙计逮捕。在太原，凡是和我认识的朋友，都被逮捕，共30余人。经过20余日审讯，严刑拷打，就逼我带三部电台，到太原做谍报工作。我把我怎么来的情况向他们说明，就又把我也转移到日军部管押（地址在坝凌桥8号原荣鸿庐公馆），我一看在这里管押有百余人，大部分是阎锡山派来作各种类型工作的人。一直到8月间，才被释。

正在这时，日伪警备队，由警务厅组织警备队干部教育队，准备增编省保安队司令部和道保安队指挥部，让我们也参加了三个星期的训练。1942年9月初，伪山西保安队司令部开始增编，司令由伪省长苏体仁兼，副司令由蔡雄飞兼任（司令部编制相当军部编制）；全省有4个道，每道增编保安队总指挥部，道尹兼总指挥，另设副指挥一人。雁门道保安队副指挥秦良骧（秦骊的号）；河东道保安队副指挥汤家模；上党道保安队副指挥张龙华（前刘茂恩军师参谋长）。保安队司令部编直属干部学校一所，招收学生培养下级干部；各道指挥部，直属干部训练所一所，轮流训练现役干部和军士（指挥部编制相当师部编制）。日寇为了便于掌握监视，在保安队司令部设专职名为辅佐官一员，由日寇退役中尉城野宏担任，他自定为保安队少将辅佐官。每道保安队设指导官一二名，由当地日军派现役中、少尉充任，全省保安队及一切伪军，都归日军部少佐参谋岩田清一负责掌握。各县的保安队虽撤去当地日驻军派的指导官，但一律由日寇县顾问兼指导官。所谓指导官，是专门掌握监视那些傀儡司令、副司令、指挥、副指挥等人言行的，稍有嫌疑，即行逮捕，并以通共产党罪名，用刺刀挑、警犬咬、活埋等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致死。

据我所知，阎锡山先后指派到日伪保安队中上级军事干部

20余人。这些人，被阎锡山陆续派到日伪区，掌握伪保安队，插入中下级干部，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桥梁作用。

从1943年春天起阎陆续派大批中下级干部到太原。除一部分经他住太原办事处政治代表靳祥坦与日寇直接联系安排工作外，还有许多不经日寇联系，由阎直接指示日伪省道保安队负责人，设法安插尤多。

1944年春，阎锡山给伪省长王骧一封亲笔信，云：“你我患难多年，现仍是同舟共济，行者居者同样有功，并希加强防共，县与县组织联防，以免共产党利用县与县边境活动。”王骧对这封信感到非常兴奋。有一次，王骧对我说：“拟撤换保安副司令蔡雄飞（蔡系东北人）职务，让你接替。”但经过和日军部研究，他们提出要“剿共”军第一师师长赵瑞接保安副司令职。过了不多时，蔡雄飞调伪山西省府参事，赵瑞接替伪保安副司令，与王骧研究征得日军同意调整保安队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反共措施。各道保安队划分联防区（三县或四县划为一个联防区），选一核心县县长，为联防区联队长，另增设副联队长一员，联队部相当一个团部组织（雁门道就组成8个联防区）；除此外，保安司令部又增编2个直属大队，各道指挥部增编1个至2个直属大队，每大队500余人（相当一个营），经常控制在省道作为机动队。总而言之，建立联防区增编直属大队，代替日寇接防反共。日寇逐次抽调兵力，增援南洋群岛，对英美作战。

1945年春，阎锡山派前骑兵军军长温怀光，秘密到太原改编伪保安队及“剿共”军，加委赵瑞为新编军第一军军长；秦良骧为第一师师长；李勃为第二师师长；汤家模为第三师师长；杨城为新编第二军军长；段炳昌为第四师师长；何焜为第五师师长；邢震华为第六师师长。1945年7月底，伪保安司令赵瑞，调集保安队省道直属大队3000余人，由他亲自指挥讨伐。名为

在晋中交城、文水、平遥、祁县、徐沟讨伐共军，实质是接受了阎锡山指示，经常与阎管区保持交通联系，不断扫清这几县八路军地方武装。正在赵瑞讨伐之际，突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原的日寇如丧考妣，将储藏的军火物资，日夜进行破坏。爆炸声隆隆不绝，人心惶惶。此时伪省长王骥深恐八路军先行进驻太原实行接收，而保安司令赵瑞又讨伐未返，便令我担任太原城防，并派人调赵瑞率保安队火速返太原，以应情况突变。我立即派人星夜骑自行车到徐沟北转达，次日早晨赵瑞率队赶返太原。在太原的日寇眷属，误认为八路军进城，万分惧怕，纷纷逃出城外，在山沟露宿。日寇军部通知眷属勿惊，一面阴谋收缴保安队枪支，一面由榆次调来一个联队，分布在太原各城门。日军部通知伪保安副司令赵瑞：次日7点所有在太原城内的保安队集中在东门里体育场，听候军部点名。次日早晨发现各街要道口架设机关枪，城门紧闭。当时赵瑞召集紧急会议，经研究，认为日寇利用点名要缴保安队的枪。于是商量对策，决定主要干部不参加点名，把现有保安队轻机枪及体力健壮部队留一半，不参加点名，全副武装在原地待命；令我化装出城，指挥城外营房阳曲县保安大队及“剿共”军干部教育队。如果城里发生冲突，听枪响，便从小北门攻进城内接应，城里撤出城外，占据东西两山上，以便与阎军楚溪春北上大军联系。日寇发现应到保安队人数不足半数，主要干部很少参加，便发生了怀疑，临时改变计划，捏造了个假情报说，现太原西山河口一带，发现八路军8000余人，距太原只60华里，命令保安司令赵瑞率城内所有保安队迅速开出城外，在汾河西岸大小柳树一带布防，这场风波才算结束，为阎锡山保住了4万余人的保安队。

(秦骧 张仲孚)

## 四 “延聘”日本人办省训团

### 从“受降”日军到“礼遇上宾”

1945年8月8日，在苏联宣布对日宣战配合中国人民夹击关东军的形势下，阎锡山看出了日军即将灭亡，于是他就产生了要利用在山西的日军力量，作为他反共的资本，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他一面急电他早已派驻太原和日军联络的代表梁缜武（山西省崞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阎的妹夫），乞求太原日军派铁甲车到临汾迎接正在汾东配合日军向塔山解放区进犯的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回太原布置阎返太原后的住所，一面又派遣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带领骑兵军星夜赶回太原，作为阎返太原的先遣队。9日上午，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按照阎的命令，先后派遣人员去同蒲铁路各县从日军手中接收。当时我是孝义县“建军分会”“新战法短期训练班”班长，也是被派遣中的一个，郭对我说，“会长（指阎锡山）派你去接收介休县，对日本人不必解除其武装，因为我们还要仰仗他们去打击共产党，而且也没有部队再派给你，只能领着介休县的公安局和国民兵团200余人，因此，在维持治安与维护同蒲路交通方面，处处得依靠日本人……”我遵照这个指示“接收”了介休县城。阎锡山于8月中旬也来到了介休县，住在北关的一个居民院内，企图由该处乘火车返回太原。在日军由太原派来铁甲车准备接阎回太原的当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将介休至平遥长达60华里的同蒲路轨完全拆掉。当时阎身旁只有三个工兵团和一个机关枪团，对此毫无办法，只得龟缩在该城，一面勒令介休县强征民夫限期将同蒲路修复，扬言要在介休登车赴并，一面却亲自乞求日军派出部队，由公路护送他到平遥，再搭火车转并。这样，阎在日军的

帮助下，偷偷摸摸地进入了太原城。

阎回到太原后，除了对所属“论功行赏”“升官晋爵”“加禄增俸”外，并委派了他的内弟徐世珙、表侄曲宪治、亲信彭士宏等，分别掌握经营了他在山西的各厂矿、商业部门和由日军手中接过来的各企业。对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向中国人民投降的日本战犯，阎不仅不治以应得之罪，反而礼为上宾，如聘请原驻太原的日本师团长向高级军官讲话（在太原师长以上的军官）。阎锡山为了蒙蔽人民，对日军的受降仪式，先宣布在9月上旬举行，并指派了曾充任过三十四军军长的张翼为受降的高级官，后又改由赵承绶担任，并将日期推至9月中旬，这个消息传出后，在太原已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话的资料时，阎认为已经收到了“政治上的作用”，就干脆不了了之而再不提受降之事了；而且对日军部队的武装，也从未解除过。

#### 办省训团让日本战犯教杀中国人

1945年10月末，赵承绶任“供给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震东是该会的事务部长，我是事务组长。有一天赵承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内对我说：“会长叫我在新南门外大营盘办省训团，主要是请日本人当教官来训练我们的军官和学生。陈震东是总务处长，你是副处长，你在这里所担任的工作，我已告诉过陈震东叫他兼办。你速去筹备开办省训团的事情，编制表明后天就可下来，对住处、食堂，及照明设备与教育用品、办公用具等，务于一星期内筹备妥当。”我说：“为什么这么急呢？时间短了，恐怕办不好。”赵说：“这是会长说的，并且绥署已经下了命令，受训者将于一星期后来团报到，你必须赶快办理，无论如何，不能误了限期。”我听了这话，意识到是个迫不及待的任务，但又纳闷，为什么不早几天着手呢？脑子里这样想，但又不好再问，只好连

连说了几个是字，退了出来。我紧接着就去找陈震东办理移交事务组的事情，顺便谈到我不理解我的新任务为什么要这么急的原因时，陈说：“你还不知道么？彭毓斌带领的增援晋城十九军的全部人马，都被共产党军队吃掉了，彭的下落不明，会长特别着急，所以要赶快成立省训团，聘请日本人作教官，来训练咱们的干部，以充实反共的力量。总司令（指赵承绶）昨天晚上12点钟从会长那里开会回来，就告诉了我这件事，并要我看看谁去筹备成立好，我当时就提出了你，总司令同意了。老弟！无论怎样，限期是不能耽误的，对日本教官的食、宿问题，更要格外办好，会长和总司令都是着重这点，千万不要大意。再有，这次所有团内的职员，都是由总司令从绥署军务处拿来大批空白委任状，由他用会长的名义直接委任，事后再行呈报，这是山西从来没有过的特殊行动。老弟！我想你一定能在这一中间体会出新任务急迫的原因了罢？你有要荐举的人，将姓名开来，我向总司令提就是了。”我听了这话，就毫不延迟地到了大营盘，日日夜夜督促工匠人等，作新建与改建的工作。其间赵承绶也曾来过两三次，并对筹备工作作了些指示。一星期以后，省训团内响起了日本教官的“你的……小小的……大大的”的命令声和受训者的不日不中的“咳噫”声了。

### “好一个难得的留日机会”

#### （一）“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哲学

11月中旬的某天下午7点钟，省训团团部早已超过了办公的时间，职员们该回家的都已陆续走了，赵承绶突然由城内他的家里给我来电话，叫我在团内等他，有要事待理。过了几分钟，赵来到团内对我说：“会长于今晚8点钟到团，将在这里住一晚，速将我的办公室腾开让会长住；至于饮食，有他的侍从官自己携

带。须传告各队，不得到会长住房附近活动；团内暂停使用号音，因为会长最近考虑问题（指上党失败），常是通宵失眠，在这里也要好好地休息一下。”这一切我都遵照办了。到8点半钟阎到了团内，工夫不大就休息了。第二天上午10点，阎在他的住房内，接见了负总教官责任的日本人，他在日本统治时期，曾充过代县的宪兵队长，阎却委任他当了中校总教官（1946年初，改由日本师团参谋长山岗担任）。阎和这位教官坐在沙发上谈话，旁边有一位翻译，我和赵承绶都站在外边屋子里，他们谈话的内容大意是：这位教官表示他要把日本部队对八路军的一套作法，完全教会给受训者，阎频频含笑点头。最后阎告诉他，如果受训者有不听话的表现，可采取打骂教育，说这话时，还向门外的赵承绶示意。紧接着阎又传见了各队队长，再三叮咛，要听日本教官的话，并要督饬受训者好好学习，并说：“在这里学习，和去日本留学是一样的，机会真难得啊！”自这以后，这批日本人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过去他们有什么事情，总是先找赵承绶陈述，再经赵指示各处办理，此后他们是直接向各处发号施令，如修改作息时间表和要教育用品等，即直接告诉教务处长张映淮办理；要改变伙食，要改变住址，就径向总务处长陈震东或副处长贾斗魁去办理，对各队的职员和受训者，更是要怎样便怎样了。表面上是山西的省训团，实质上变为日本的山西省训团了。

## （二）省训团内的日本“禁区”

省训团大楼东北角地面上有日军树立的一块大石碑，连底座有两米多高，上面用中文刻着“黑水部队驻此”六个大字，旁有昭和年、月、日字样，这是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铁证，也是中国的国耻纪念物，当我发现了这件东西向赵承绶请求如何处理时，赵说：“按理应当去掉，不然太有点说不过去；不过目前我们正依靠着日本人，如果取消的话，那对他们（指日本人）精神上是

会有影响的，起码要减低他们在训练中的作用，对我们反共力量说来，是极端不利的，你不如在上面贴个大标语，上写‘阎会长万岁’盖住了它，这样做较为合适点。”我依照赵的话做了，但是标语受到太阳、风、雨等自然界的侵蚀，不能永远保持着原样，而是石碑上的字和标语上的字，经常互相配合着，因之，时而出现“阎黑水万此”，时而出现着“黑会长驻岁”，或者是其他的字句，虽然我经常更换标语，但仍阻止不了上述现象出现。这个自然的巧合恰好揭露了阎、日勾结的丑恶面貌，但是这块石碑在省训团内确成了日本的一块“禁地”，这更是阎锡山奴颜侍敌的铁证。

### （三）十辆卡车

11月下旬的某天，赵承绶带领着教育长刘奉滨（后易王乾元）、教务处长张映淮和我，以及总务处所辖各科长（事务、粮服、食堂经理等）去检查内务时，发现有十辆大卡车停在日本人的住房前，但零件及轮胎等完全没有了，赵当时回过头来向我说：“这十辆卡车是我前天接收过来着开到团内的，为什么你不经理起来？”我听了这茫无头绪的话，真是无所措手足，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好，只好硬着头皮说：“我不知道这事。”赵恨恨不已地说：“你真是不会办事。”我心里说这下可糟了，谁不知道赵承绶绰号“赵二虎”，喜怒无常，这一下我定要吃苦头了。后经调查，是日本人将车开来后，把马达、轮胎等拆下来拿到市场上卖掉了，而且赵事前也没有告诉过我，因此，这十辆卡车就任凭日本人明目张胆地破坏了，赵不敢过问，便不了了之了。至于我在筹备期间，在地下挖掘出来日本辎重部队所埋掉的军刀、马掌、药品、酒类、军装等，虽然都曾向赵承绶报告过，自然是都归纳于“不咎既往”的框框里边去了。

### （四）“鄙人事件”



在省训团训练军官第一队中有个日本炮兵教官（姓名忘记了），此人在1947年参加汾孝战役时任炮兵连长，被解放军在战场上击毙。他为了使受训者对他所教的炮兵常识要好好学习，用似通非通的中文写了一篇讲话，在开头写着“鄙人所讲述的一切……”等字样，其中语句，大部只能会意，如果从文字来解释，是难令阅者理解的，而且在其中凡是提到他时，他总是客气地自称“鄙人”。不知道是哪一位日本教官看见了，向总教官山岗说成是省训团出现了反对日本教官的标语，称教官是“敌人”，山岗就向赵承绶大兴问罪，赵当天夜里将我由城内我的家里叫到了省训团，问我有没有这类的事情。我说：“没有发现过。”赵向我发了一顿脾气，埋怨我没办好，以致日本教官怀疑我们对待他们不好，这将影响到我们的反共事业了。我受这场申斥后，连夜派出总务处所辖的事务科成员，在团内团外各墙壁上查看，也未发现。第二天山岗还是怒容满面地带着10几个日本教官同赵承绶和我去查看，在第一队学员住室内，发现了原来是“鄙人”和“敌人”的误会，山岗笑了，说是误会了，赵承绶笑了说：“这位教官真热心。”我也笑着说：“各位教官都好，如果在生活上感到我们有照应不到的地方，还请多加指教。”

### 日本教官豪华的生活与“两个请愿的标语”

263

赵承绶秉承阎锡山的旨意，对这批教官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待遇，在团内为他们设有最好的日本食堂，连他们的日本军妓也受到了极优厚的待遇，为她们另辟有日本式的住宅，生活费用都由团供给。这些日本人的待遇和我们这些在抗战期间跟随阎的人来对比，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就这样，赵还感到不够，还规定每星期天由各队或者由教务处在太原各大饭店宴请他们，因为这笔款要经总务处的手，所以不论是谁出名“请客”，陪客中总少不

了我。当时所有的军官队、汽车队（受训者是招来的学生）、电讯队（分有线与无线，也是招来的学生）、军犬军鸽队（也是学生）和养马场等，差不多每星期日在各饭店中都包有定座，自下午4时至深夜，都是在一片花天酒地中度过。

阎回到太原后，裁减了一些对反共说来是可有可无的机构，所有这批编余的人员，都送到省训团军官队。其中有一位是跟阎在克难坡某经济部门担任秘书的，我记得他姓阎，他的左手小，生来就是个残疾，也是五台县人，家中人口多，负担重，他又是个靠薪水生活的人，1946年被编遣下来，送到省训团后，接连好几个月又未发饷，有一天他来找我，想要借一个月的饷，来维持他家庭的生活，我把这情形向赵承绶请示，赵说：“对这批人在他们的薪饷未领下来前，团内是不能也无法支垫而预先借饷的，一个人固然垫得过来，但此风一开，那还受得了。”我将团内无法支垫的情形向这位秘书说了以后，他一再向我请求通融一下。在我始终未允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城内，写了两个标语：“抗战时全民全面”，“享受时几人几家”，贴在他的身上，向阎的住处——“太原绥靖公署”请愿去了。结果怎样，我不知道，不过从此这位秘书再没有到过团内。至于请愿的事，是赵承绶告诉我的。

264

### “一个灯泡”等于“一条人命”

省训团内接二连三发生了电线被割与灯泡遗失的事件。原来这些照明设备，是我亲自同包商议价安装的，我在其中得了一批回扣，当断路事件发生后初期，我还认为是我得的回扣多了，以致包商们不得不投机取巧而造成的，因而我在事故发生后，继续去修，但仍是接连不断地出现断路，这样就使我注意起来了。在1945年12月的某天，团内正在编队的时候，我在东边第三个院

内，一个原来收编过来（皇协军）的尉级军官行李旁，发现了一个带有半尺长电线的灯泡，这位军官的姓名我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清楚的是：他的个子不大，面部黑黝黝的，我问他这个灯泡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从街上五金商店买来，准备拿回给我家里安装的。”我说：“为什么上边还有线？”他说：“是买的时候连灯口、电线一起带上，拿回家去接上就行了。”当时我们的问答，充任队长的雷仰汤也在场。我把这线与灯泡和省训团内的对照一下，发现又是同一牌子的。于是我先把团内接连不断发现照明设备遭到破坏的情形向赵承绶报告了，赵很着急地问我：“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么？”接着我又把这位军官的事情报告了，赵立刻集合全团讲话，把这位军官五花大绑，派兵 10 余人押在卡车上，开到省训团外西南空地上枪杀了。事后赵承绶向阎锡山报告了这件事，阎在朝会上还把这事宣布，并说：“共产党破坏省训团的训练，我们已经破获了它的地下组织，把人也枪决了。”

1946 年底，阎将省训团改为亲训团，并派了他最亲信的特务头子王靖国接替了赵承绶的职务，而由阎亲自出马来主持该团的训练了。

（贾斗魁）